

中西科学结合的艰巨任务

M·波克特 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

中医是中国对人类的知识宝库的最辉煌贡献之一。但在四五十年代毛泽东提倡的明智而又令人鼓舞的政策，如今却因缺少一种始终如一的方法学概念而正以令人惊异的速度从内部腐蚀下来。主要表现在遍及全中国的中西医之间的令人十分痛心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使中共中央 1958 年 11 月的指示落空，使毛主席所说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成为空谈。

表面的公开的不平衡是，在综合医院中，中西医的比例大约为 10:90 或者不到 5:95，奇怪的是，在中医研究机构和中医学院也存在这个比例。本质的和内在的不平衡是，两个医学体系在方法论上的差异造成的中国对中医的歧视，例如即使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成都中医学院的病例，90%是用西医诊断学和病理学的术语写的，而中医的看法却被压缩为一小段甚至一两行字。

一、自我摧残

目前，中国传统医学所面临的困境是某种误解的结果，而这种误解是由西方科学固有的错误产生的。

由于西方医学以因果分析为依据，可以对物质、躯体现象、躯体性疾病作出精确的判断，以及西医外科手术的断然措施和化学治疗的明显效果，因而有人主张按西医的方法来加强研究和治疗。这种论调是西方文化的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实际上，经过正规训练的中医，对个体机能失调作出精确的、特异的判断，并进行治疗，直到今天西医还做不到。

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全人类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从十九世纪到现在完全没有作出决定性的努力，按照中医的本来面目，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二、极大的谬论

那种“科学的西医学、经验的中医学”的说法是一个极大的谬论，为害极深。为了阐明这一点，首先必须对什么叫科学有一个明确的看法。

什么叫科学，科学必须符合以下三条标准：

1. 正面经验，它是与单纯的臆测相对立的，这是科学的必要条件。所谓正面经验，是经验资料的积累，能够重复和验证。
2. 陈述的单义性，即：在一定的上下文意义中，对每一个单一的陈述都只有一个精确规定的含义并排除其它的含义，哪怕是稍微相似的含义。
3. 经验资料的严格、合理的综合。严格的，是指不是任意的、含糊的和近似的；合理的综合，是指从收集到的经验资料中建立起合乎逻辑的联系。这种联系使人们能对未来事物迅速做出有把握的灵活推断，并使原有的结果再度产生。

按照这三条标准，可大致将二十世纪的种种科学分为精密科学、原始科学和伪科学。少数学科，如物理、化学、天文学几乎完全符合上述三条标准；多数学科只符合第一条，可称为原始科学；只符合第二、三条的，则应称为伪科学。在现代医学中，绝大多数是原始科学的知识，只有一些小据点是精密科学，还有一些较大的伪科学的据点。与此相反，中医除了还有一点原始科学和伪科学的残存外，大部分是精密科学。我这样说出来，叫你们大吃一惊。

要达到陈述的单义性，就得应用常规的标准来表达。西方科学当前应用最广的常规标准是所谓的米制（厘米、克、秒制）。但是，标准本身并不是任何发明或发现的结果，更不是自然法则。相反，它们必须适合它们服务于的方法学和技术上的需要，一定的方法学和技术，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合的常规标准，来达到定性陈述的单义性。中国科学家反对使用阴阳五行作常规标准，正好像西方科学家禁止使用米制来表达定量陈述的单义性一样荒谬。

是否需要外国人来帮助中国人认识中医学的科学性

传统中医学与西方医学属于两个不同范围，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小一部分治疗潜力被挖掘出来。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有三：

1. 设法使中国的一些第一流的学者掌握认识论，即有关现代科学在方法上与中医学相适应的认识论。这个任务开始可能需要西方学者的合作。
2. 开发中国传统医学宝库，这任务基本上应由中国的学者来承担。但这取决于上述第一项任务完成得好坏。
3. 系统地发展现代技术，譬如研制和检定新药的新技术，机能诊断的新技术，在医学文献迄今还没有凶手进去的中医治疗机能性或退行性疾病的方法学和具体方法。这项工作也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

西方医学已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那么世界各国是否要等待中国也走入死胡同去认识现代医学的基本危机呢？还是现有的征兆和论据已足以唤起和振奋她的困惑的天才们呢？

中医学——独具一格的科学

——不同的方法论要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

M·波克特 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

在西方科学技术大量传入，使包括医学在内的所有传统知识受到轻视、排斥的情况下，一些传统医学的拥护者力求用西医学术语解释中医，他们认为这样能使人们相信传统技术的价值。动机是善良的，但是想要保卫本国医学遗产的人实际上是在抛弃和毁灭他们打算维护的东西。以解剖学为例，可以得到很大启发。

中医流传两千多年，除《难经》外，没有一篇文章得出过超出“有些脏器在膈上，另有一些脏器在膈下”水平的“解剖资料”。但几乎每篇都有简短章节论述“脏”。在自封的“专家”们看来，尽是一些实际的推测和枯燥无味的理论。在历史上，中国的屠夫屠宰过千千万万只猪，刽子手曾把成千上万的人开膛破肚或千刀万剐，中医师难道会如此草率地检视内脏的情况吗？还是太笨，不能把所见到的情况描述清楚？唯一合理的解答是中医采用的是归纳和综合的认识方法。直到现在，西医还是对不需任何工具就能看到的病人大量重要机能变化量置之不顾，然而正是这些机能及其变化，构成了中医学的精华。这些机能的描述就是脏象的基本内容。

如果仔细查阅中医学中有关脏象的章节，就会注意到几乎所有的陈述都是关于错综复杂、相互依存的生命机能及其循环运转的模型。我们可以把这种模型称之为“机能环”（orbs of function），它相当于核物理中所应用的图解模型。这种图解不是描述解剖室内所观察到的东西，而是系统化了的运动规律。相反，西医对器官的描述总是把机能附属在解剖上的解释之后。西医对已知的生命机能如果说不出是属于哪个器官，便会感到很感处理。而中医对某一器官的病症如果说不出是什么机能的失调，也会感到困难。

不是以“精密科学”的普遍标准来衡量中医学，而是以只适用于西方医学的方法来评价中医学，是不合理的，必然导致失败。这种试图就等于是白天观察星星，在无月光的黑夜观察云彩一样，是缘木求鱼。

盲目崇洋的危险后果

M·波克特 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

就医学而言，由于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中国人心灵上造成的模糊和麻痹，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克服，连一些中国的医学家和政治家都没有认识到上述事实。因此，在我访问期间，我们见到和交谈的几乎所有医务界的代表都按照这种外来的教条主义和不合理的前提发表议论和行事。都认为西医是科学的，相反，中医学则只不过是经验资料的积累。这种偏见继续恶性循环：在当今的中国，土生土长的医学科学（中医）不能和西医享有同等的学术地位；专门研究中医的机构只有很少的经费，而且没有对中医基本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研究。在今天中医的代表人物（应该指出的是，波克特先生所能见到的“中医代表”并不是真正的中医代表——编者）的希望是，要尽最大努力把西医学的术语和方法接收过来。这种荒唐的不合逻辑的妥协，不是在推迟，而是在加速中医在中国土地上崩溃和全面消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代中期、六十年代中期和七十年代中期出版的“三代”半官方中医教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医精华的崩溃。这种倾向如不迅速而有力地加以扭转，在中国曾在理论上、实践上达到最成熟、最有效的水平的医学，在本世纪末以前将成为过时的东西。

作者简介：

M·波克特，一位谦和友善、年逾古稀的德国老人，一位受人尊敬的汉学家。他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满晰驳，取意为“以饱满的责任感反驳西方明晰科学的不足”。他曾任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在欧洲，他不仅是与李约瑟齐名的汉学家，而且是一位中医学专家。他的名片上印着：“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中医理论基础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国际中医规范辞典执行主编”。

他精通德文、法文、英文、拉丁文以及俄语等，中国话讲得相当不错。他的藏书甚丰，收藏的中文书籍有近万册。他广泛研读了中国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经》、《书经》、《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墨子》、《列子》、《淮南子》、《春秋繁露》、《论衡》、《战国策》、《后汉书》、《道藏》、《抱朴子》、《大同书》等；文学小说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封神演义》、《隋唐演义》、《平妖传》、《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状》以及冯梦龙的《三言》等，他也读过不少。他研读更多的，还是包括《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在内的诸多中医典籍及现代中医著作。在40多年的教学与研究中，他编著出版中医图书有：《中医临床药理学》、《中医方剂学》、《中医针灸学》、《中医诊断学》、《中药学》、《中医基础理论》。其中他的《中医基础理论》一书，风靡欧美，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多次出版。他在德国慕尼黑创办过“国际中医社团”（SMS），开展专题研究，并多次在世界各地举办学习班、报告会、学术交流会。数十年里，矢志努力，耕耘不懈。

他为了中医的振兴和发展，1979年以来先后5次来到中国。1999来北京近两个月，就住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原“中国中医研究院”）。他的中国同事和朋友亲切地称他“老满”，或“满教授”、“满先生”。有人把他誉之为活着的白求恩。他对中医发展的观点，被国内学者广泛引用。

太乙天符年人、禽流感的中医学解析

李致重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在人类医疗卫生体系中，世界上只有中国是把中医与西医并列为两个主流医学的国家。国际间讨论医疗卫生问题，话题里只是西医，极少涉及中医。在这种“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中，中国处于绝对的少数。这就要求中国应有一种明智、坚定的立场：既要努力增进合作，更要努力坚守自我。如何保持发扬中医的特色与优势？如何让世界逐步认识和接受中医？对于这两大问题，要有长期的打算，要做卓绝的努力，而且责无旁贷。

2003年的SARS和随之而来的禽流感，尤其是禽流感可能引发的“人传人”问题，人类正处于空前的“病毒恐惧”之中。这对中医是挑战，也是机会——不在惊涛骇浪中倒下，就在惊涛骇浪中崛起！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本月初在香港凤凰电视台上，卫生部高强部长面对海内外观众明确地指出：对于可能发生的大流感，中国的经验和优势就是中西医配合。中医因此受到鼓舞，当然更是压力。

一、太乙天符年与人流感恐惧

（一）何谓“太乙天符”年

“太乙天符”一词，出自《黄帝内经》。见于把天文、气象、历法与流行病联系起来，探讨流行病发生特点和规律的“五运六气学说”。

据运气学说所载，在“运气同化关系中”，“天符”、“岁会”、“同天符”、“同岁会”、“太乙天符”这些词汇“是用以说明运与气相会的年份”的。（具体含义，这里不做详细解释）在这些年份里，“气象变化比较单一”，“因此而造成一气偏胜独治，这样就容易给人体和其他生物造成危害。”

在干支纪年法的每六十年一个周期之中，属于“天符”的共有十二年。即乙卯、乙酉、丙辰、丙戌、丁巳、丁亥、戊寅、戊申、戊子、戊午、己丑、己未。“天符”中属于“太乙天符”的，共有四年。即戊午、乙酉、己丑、己未。按《素问·六微旨大论》、《素问·天元纪大论》的意思：“太乙天符”指的既是“天符”，又是“岁会”的年份。即指“岁运”与“司天之气”、“岁支之气”的五行属性三者会合主令。正由于这四年“均为司天、岁运、岁支的五方正位三者会合的年份”，所以在这些年里，人如果为“邪所伤，则病势急剧而有死亡危险。”《素问·六微旨大论》还将这四年称为“贵人……统乎上下”之年。提醒人们应当知道，在天时